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評「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

Review of “On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oi:10.30390/ISC.200011\_39(11).0004

問題與研究, 39(11), 2000

Issues & Studies, 39(11), 2000

作者/Author : 黃旻華(Min-Hua Huang)

頁數/Page : 71-9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0/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11\\_39\(11\).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11_39(11).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評「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 建構主義」

黃旻華

(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班研究生)

## 摘要

莫大華博士的「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一文，是國內近來少數對於「建構主義」有系統介紹的文章。然而莫文並未有效闡明近二十年來的國關理論的發展，以及「建構主義」在「第三次大辯論」的角色和地位，使得該文產生若干誤解。其中主要問題在於將 Alexander Wendt 視同與其他建構主義學者為一「建構主義巨型理論」，卻沒有提及 Wendt 與這些學者的明顯差異。如此一來，不但模糊不同「建構主義」流派的發展，也使其對於「建構主義」的介紹不夠周全。

關鍵詞：建構主義、科學實存論、第三次大辯論、國際關係理論

\* \* \*

## 壹、前言

國際關係理論近二十年來的發展用巨變來形容並不爲過，其中「第三次大辯論」所引發國關學界一連串的爭論正可對此作一完整的回顧與概說。然而近年來國內學界鮮少有專文對此詳細介紹，<sup>①</sup>而莫大華博士於本刊所發表之「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一文，<sup>②</sup>可說將近來不同「建構主義」學者的文獻作一有系統的介紹，對文

註① 就個人目前所知，對此議題有詳細且深入探討的專文，僅有莫大華與黃旻華少數學者之文獻。參閱：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9期（民國88年9月），頁93~109；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民國87年5月；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發表於「第一屆全國政治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該論文並獲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評選為「唯一特優論文」），民國88年5月；黃旻華，「集體行動的另類邏輯：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未發表手稿。

註②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

獻整理與回顧有一定的貢獻。不過由於莫文並未對近二十年來的國關理論發展，特別是後實證主義與社會科學哲學的部分，闡明「建構主義」在「第三次大辯論」中的角色和地位，使得該文產生許多誤解。因此本文目的在於釐清與補充莫文的論述，並藉此說明細膩理解「建構主義」的重要性，俾有助讀者瞭解國關理論近來發展的全貌。

下面將分成五部分來進行論述：一、討論「建構主義」學者的「分類問題」。二、闡明「建構主義」在「第三次大辯論」的立場。三、說明以「科學實存論」（scientific realism）為哲學基礎的「建構主義」學者 Alexander Wendt 與其他「建構主義」學者的不同，以及其對於理解「第三次大辯論」的重要性。四、釐清莫文在理解「建構主義」上所發生的誤解。最後則是結論。

## 貳、「建構主義」學者的「分類問題」

近年來「建構主義」學者在歐美學界已經不能再以「少數」（minority）稱之，<sup>③</sup>不管是美國的主流國際關係期刊 *IO*、*ISQ*、*WP*，甚至是實證主義傾向濃厚的 *APSR*、*IS*、*JCR*，還是原本在一九八〇年代便一直對於「建構主義」發展十分關注的英國學派，都已經不乏對於「建構主義」興起的重視。<sup>④</sup>然而欲正確理解「建構主義」的主張，必須掌握下列三個原則：首先，「建構主義」絕非一個從社會科學哲學、方法論到理論內容層次，具有高度一致性與一貫性的「巨型理論」（grand theory）；唯有充分了解存在於不同「建構主義」學者之間的細緻差異，才能真正體現「建構主義」在國關理論中近年來發展的脈絡。其次，對於「第三次大辯論」及當代國關學界受社會科學哲學潮流影響的理解，則攸關能否具備深入「建構主義」，特別是以 Alexander Wendt 為主的「建構主義」學派主張。最後，必須要能時時掌握美國學界與歐洲學界在國關理論演變上的趨勢，尤其是不同學派所著重的研究議題，才能貼切地認知國關學門的發展，不至產生錯誤的歸類和概述。這三項原則，所凸顯的是「建構主義」本身的複雜性，以及其「跨學門」特質對於理解的困難性。事實上這也反映了八〇年代以後國際關係學門的困境。不但學者間缺乏對於學門範疇的大致共識，不同學派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核心課題，乃至理論與實踐上所產生的巨大差異，都使國關學界呈現幾近分裂，並且難以統整成同一學術領域的窘境。這點尤其對於身處歐美學界之

<sup>③</sup> 關於對「建構主義」發展有系統介紹的書，下列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Vendulka Kubálková,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sup>④</sup> 舉例而言，即使實證主義立場最強烈的衝突解決季刊 (*JCR*)，也開始有學者將「建構主義」的論點來做經驗檢證。儘管許多人認為他們操作化後的「建構主義」不能真正代表「建構主義」觀點，但起碼反映主流學界已經接受「建構主義」論點是可能成立的選項之一。參閱，Brian Lai and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 1816-1992,"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2 (2000), pp. 203~227.

外的台灣學界來說，更是難以理解其原因所在。

廣義的說，「建構主義」學者可歸類成三種典型，這也是莫文中對於「建構主義」學者分類的概括和指涉。⑥

一、從科學哲學的特定哲學基礎「科學（批判）實存論」（Scientific/Critical Realism）⑥出發，對於「第三次大辯論」中所隱含的本體論、認識論乃至方法論作一有系統的建構，強調「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都在認識論上犯了「反實在論」（anti-realism）的謬誤，⑦將社會本體的建構，化約在認識論的激進主義立場上，導致其對於「科學活動」的錯誤理解，以及產生「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客觀主義－主觀主義」等不應是截然二分、對立的辯論。⑧這類學者以 Alexander Wendt、David Dessler 為主，近來亦有些英國學派學者如 Heikki Patomaki、Colin Wight 屬於此類。

二、在美國學派中，多半所謂的「建構主義」學者並不贊同 Wendt 在社會科學哲學上如此強的主張和著墨，這些學者在八〇年代並不自稱為「建構主義」，也鮮少有

註⑤ 明顯地，莫文對於「建構主義」看法受 Ruggie (1998) 影響不少(從他對於 Ruggie 引註和引用上可看出)，因為 Ruggie 所提到的三種建構主義者—「新古典建構主義者」、「後現代建構主義者」、「自然主義建構主義者」，正好包括莫文中所指涉的所有「建構主義者」，甚至他還延伸到「批判理論」學派。然而本文以為，莫文對於 Ruggie (1998) 的理解可能並不完整。首先，Ruggie 在試圖對「建構主義」分類時，他早已提醒由於當前學界對「建構主義」的指涉過廣泛，所以他的嘗試僅是從概略的哲學立場上來分類。這代表 Ruggie 實際非常重視「分類」在理解建構主義上的意義，否則他不會冒著風險來做他本身都提醒分類所可能發生的問題(pp. 880~881)。其次，Ruggie 的分類是從哲學上來看的，因此嚴格說來，他其實並非希望對「建構主義」作如此泛稱的指涉，否則他不會引用 Campbell (1996) 對於 Wendt 及他本人的批判作為例子，來指涉「建構主義」本身亦缺乏共識的情況 (Campbell 批判他們有「笛卡爾式焦慮」，這是典型後現代主義對於實證主義的「著落主義」立場批判)。這裏 Ruggie 要表達的，不是「建構主義」應包括 Campbell, Neufeld, Wendt 及其他文中所提到的學者，而是他認為「建構主義」的定義應該要更為嚴謹，換言之，他是希望「建構主義」不單只是一種「本體論」上的觀點，而能有一致性的研究綱領(p. 884)。最後 Ruggie 則希望「建構主義」應與主流的「新效用主義」(neo-utilitarianism)能有逐漸趨同的發展(p. 885)。上述這些都顯示，Ruggie 分類的意圖不在於統稱這些學者為「建構主義」，而是強調從理解這些差異中，「建構主義」能逐漸往 Kuhn 的「常態科學」發展。參閱，John G.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55~885.

註⑥ 關於「科學實存論」的介紹，以及「科學實存論」與「批判實存論」在名稱上的差異(這裏基本上都是指涉 Roy Bhaskar 的科學實存論)，參閱，黃曼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 50~75。Roy Bhasker, *Reclaiming Realit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1989), ch. 9.

註⑦ Heikki Patomaki and Colin Wight,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s of Cr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00), pp. 213~237. 以及黃曼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 18~24。

註⑧ 關於此辯論，參閱 J. Donald Moon, "The Logic of Political Inquiry: A Synthesis of Opposed Perspectives?" in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on,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quiry*, Vol. 1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5), pp. 131~228. 以及黃曼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 17~34。

學者將其置於一「建構主義」巨型理論流派來討論，<sup>⑨</sup>事實上這些學者多半是從美國學界在八〇年代對於「典範之間辯論」（Inter-paradigm Debate）<sup>⑩</sup>的反省，從制度主義和許多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出發，來挑戰以「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唯一焦點的偏狹走向。<sup>⑪</sup>此類學者主要包括 Nicholas Onuf, Friedrich V. Kratochwil, John G. Ruggie, Ernst Haas, Peter Haas 及 Martha Finnemore 等，他們多半傾向更為接近現實的國際政治分析，甚至有些還具有實務參與的經驗。<sup>⑫</sup>

三、雖然前兩類學者也十分強調「制度」、「規範」和「文化」等概念在國際關係研究上的重要性，但多半英國學派的學者既非如 Wendt 如此強調科學哲學的理論根源，也不像其他美國學派的建構主義學者仍以現實政治運作為主要研究焦點。他們主要是從對「實證主義」的「後設理論」（meta-theory）層次批判出發，強調「規範性理論」（normative theory）的建構，並且反省和思索國關理論在「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xis）問題上的意義，以及尋求超越「第三次大辯論」的可能性。<sup>⑬</sup>儘管這些學者在許多主張上與前兩類的學者相近或是一致，但若以「建構主義」來對他們加以統稱，則可能將其與前兩類學者許多的重要差異，甚至這些學者自己之間的不同理論觀點，完全忽略而視為等同；這對於理解此類學者的研究工作來說，會產生根本性的誤解。比如說，將 Robert Cox 視為「建構主義」學派學者，就是非常可能引起誤解的歸類。<sup>⑭</sup>因為 Cox 本人在八〇年代對於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貢獻，使其被歐美學界歸

註⑨ 除了 Onuf (1989) 之外，幾乎沒有國關學者在九〇年代之前清楚的提出「建構主義」的概念。事實上即使像 Kratochwil (1989) (另一傳統建構主義學者)，也沒有明顯的提出「建構主義」概念。參閱 Nicholas G.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註⑩ 關於「典範之間的辯論」，參閱黃曼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第三章第一節。

註⑪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8), pp. 324~328.

註⑫ 比如說 John G. Ruggie 目前就擔任聯合國的助理秘書長(A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1997~present)。關於其個人簡歷，參閱<<http://www.columbia.edu/cu/sipa/RESEARCH/jgr5.html>>。

註⑬ 關於英國學派的貢獻，以及其在方法論上一貫的傾向，參閱 Roger Epp, "The English School on the Frontiers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ermeneutic Recolle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Special Issue (Dec 1998), pp. 47~63; Richard Little, "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3 (2000), pp. 395~422.

註⑭ 儘管 Cox 的許多主張可能與目前的「建構主義」有相當多契合之處，但將 Cox 稱之為「建構主義」學者，不但沒有辦法將其長久以來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反映出來，甚至會讓人誤解其學術上的地位，因為「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上並非具有悠久的歷史，然而在此之前 Cox 已經在「第三次大辯論」有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國際關係批判理論」方面。對於 Cox 學術生涯的介紹，參閱 Timothy J. Sinclai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obert W. Cox and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in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8. 黃曼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 259~273。

類為「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學派」的代表人物，而這裏並不適宜將「建構主義」和「批判理論」化約為等同的學派主張，<sup>⑯</sup>甚至就批判理論而言，我們有必要對於「哲學上的批判理論」、「廣義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和「狹義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不同的指涉進行細膩的討論，<sup>⑰</sup>否則就完全將「後實證理論」的各學派立場不加解釋加以混同，這在理解上是錯誤的。<sup>⑱</sup>

回到先前所提理解「建構主義」的三原則，「分類問題」所凸顯的是在這些學者的理論觀點和立場逐漸趨近的同時，如果沒有清楚地對其理論來源、發展脈絡和主要差異作一個精準的概述，則實難理解為什麼要將這些看似差異頗大的學者稱為「建構主義」學派；事實上在上述的分類中，本文主張不應將第三類的英國學派學者以「建構主義」學派指稱之，因為如此不但沒有體現這些學者在「第三次大辯論」中的角色和地位，也沒有反映出近二十年來「後實證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時序性。

### 叁、「建構主義」在「第三次大辯論」的立場

儘管本文對於「建構主義」的分類，主張應以更細膩的方式為之；然而下面對於「建構主義」的討論，在指涉上仍以莫文所概括的這三類學者為基準。不過為了精準的指稱這三類不同的「建構主義」學者，這裏將以 Wendt 指稱以「科學實存論」為基礎的建構主義主張；而將莫文所指涉為「建構主義」的上述第三類英國學派學者以各個「後實證主義」的立場稱之，如 Robert Cox, Andrew Linklater 和 Mark Neufeld 為「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學派」學者（簡稱批判理論學者），Richard Ashley, David Campbell,

註⑯ 關於 Cox 在「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學派」中的地位，參閱 Mark Hoffman,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Paradigm Debat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6, No. 2 (1987), pp. 231~249; Andrew Linklater,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1 (1992), pp. 77~98; Jurgen Haacke, "Theory and Prax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bermas, Self-Reflection, Rational Argumenta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2 (1996), pp. 255~289.

註⑰ 基本上在國關文獻中，談到「批判理論」時有三種用法。一是指「哲學上的批判理論」，也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傳統」，以 Horkheimer, Adorno 與 Habermas 為代表。二是「廣義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即泛稱「國際關係的後實證主義學派」，基本上就是那些在八〇強烈挑戰主流實證主義學派極端的「著落主義」(foundationalism) 立場，這包括了如 Robert Cox, Richard Ashley, R.B.J. Walker 等人。三則是「狹義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也就是專門用以指涉「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學派」，如 Robert Cox, Andrew Linklater, Mark Hoffman 和 Mark Neufeld 等；因為到了八〇年代末期之後，許多原先共同挑戰「實證主義學派」的學者本身在「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產生很大的歧異，因此這裏必須加以區分。

註⑱ 後實證主義學者之間的差異往往不亞於其和實證主義學者，舉例來說，Smith (1996) 就會對於各後實證主義的「認識論」立場進行比較分析，其間即可看出各學派的差異很大。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44.

Der Derian, Cynthia Weber 和 R. B. J. Walker 為「國際關係後現代主義學派」學者（簡稱後現代主義學者）以及 Spike Peterson, Christine Sylvester 和 Ann Ticker 為「國際關係女性主義學派」（簡稱女性主義學者）；<sup>⑯</sup>至於對於上述第二類學者，則仍以「建構主義」學者稱之。

關於「第三次大辯論」的背景介紹，已有相關的中英文獻詳細的介紹，故這裏不再贅述。<sup>⑰</sup>然而必須提醒，由於「分類問題」所造成「建構主義」在指稱上的「歧異性」（heterogeneity），以及學界在「第三次大辯論」的時空脈絡下並無如此統整的「建構主義」指稱；甚至「建構主義」僅是邊緣化的少數主張，並不被視為是具備成為一「完整理論」的系統化觀點。因此本節的標題——「建構主義」在「第三次大辯論」的立場，嚴格來說是十分容易令人誤解的，因為回顧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中期有關第三次大辯論的文獻，除了 Wendt 和 Onuf 外，實難稱得上「建構主義」有真正參與「第三次大辯論」。然而為了將莫文欲指稱的「建構主義」意涵包括在本文的分析中，這裏不得不此標題來表示莫文所謂「建構主義」和第三次大辯論的關係。事實上精確而言，下面論述所包涵的理論立場其實早已超出一般學者在「第三次大辯論」脈絡中對於「建構主義」的認知，這點是必須謹記在心的。<sup>⑱</sup>

基本上「第三次大辯論」有四個軸向的核心論爭可供我們來檢視不同學派的立場，分別是「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論爭、「客觀－涉入」的「理論－實踐」議題論爭、「著落主義（foundationalism）－反著落主義」論爭以及「個體主義－整體主義」論爭。<sup>⑲</sup>我們將依序從 Wendt、其他「建構主義」學者和「後實證主義」各學派——「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來進行討論。

Wendt 對於「建構理論」的主張，其核心圍繞在「結構－行動者」問題的概念

註⑯ 關於各後實證主義的討論，參閱，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第四章和第五章。

註⑰ 中文部分，參閱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第三章到第五章；英文部分，參閱 R. Maghroori and B. Ramberg, eds., *Globalism versus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Debat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Michael Bank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Michael Banks, ed., *Conflict in World Society: A New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4), pp. 3~21；Michael Banks,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M. Light and A.J.R. Groom,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5), pp. 7~26；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1989), pp. 235~254；Mark Neufeld, "Who's Afraid of Meta-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2 (1994), pp. 387~393；John A. Vasquez, "The Post-Positivist Debate: 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Enqui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Enlightenment's Fall," in Ken B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ch. 10.

註⑱ 如果仔細檢閱八〇年代有關「第三次大辯論」的文獻（如註⑯），事實上沒有任何文獻提到「建構主義」，這也是為什麼本文一直要強調不能將「建構主義」一詞濫用的原因。

註⑲ 參閱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

上。事實上 Wendt 從一九八七年首次在 *IO* 所發表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到一九九九年其大作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出版以來，<sup>②</sup> 其一貫的立場就是以「科學實存論」為其哲學基礎，強調上述這四個面向的論爭之所以產生，都是因為陷入了認識論極端主義的死胡同，並且完全將本體論的主張忽略或者斥為無稽之談。簡單而言，Wendt 強調社會科學的研究，因為其研究客體所具有「主客交融」和「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s）的特質，<sup>③</sup> 加上「真實的分層化」（stratification of reality）<sup>④</sup> 以及人類有限的認知能力，都使得本體論上的「結構—行動者」關係所呈現的是一種「相對恆常標的」之「再生」（re-produce）和「轉化」（transform）的「相互構成」（mutual constitution）關係，<sup>⑤</sup> 這樣的關係同時消融了「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和「個體主義—整體主義」的辯論於無形之中。因為原本存在於實證主義與詮釋學派對於「社會客體」（social object）應奠基於認識論上「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論爭，從科學實存論來看，<sup>⑥</sup> 認識論不能、也不應該成為裁決人類知識是否「可靠」或「真實」唯一標準。相反地，正由於社會本體在「結構—行動者」關係上的不斷「相互再生和轉化」，使得存在於認識論層次的「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論爭變得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存在」本身是「超驗」（transcendental）的「本體論」問題，而認識論層次對於「個體主義」或「整體主義」的預設和爭辯不但無助於對「本體」的了解，同時更是將自身對於「本體」的認識侷限在認識論的框架下。換句話說，科學實存論強調「社會科學研究」不存在任何「科學方法」和「詮釋學」的內在衝突，同時亦無所謂「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對立矛盾，這兩軸向所存在的鴻溝對於科學實存論來說，是統一在其「強」的「本體論」主張及「弱」的「認識論」主張而所體現出不同於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之下。<sup>⑦</sup>

在這樣的觀點下，Wendt 所主張的「建構主義」在另兩軸向論爭上則必定充滿折

<sup>註②</sup>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5~37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p>註③</sup> Andrew Sayer,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35.

<sup>註④</sup> Roy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78), pp. 56~62.

<sup>註⑤</sup> 所謂「相對恆常標的」是指「社會客體」雖不像「自然客體」是「永恆的科學標的」(intransitive objects of science)，然而其所具有的「相對恆常」性質，使得其可以成為科學研究的標的。這樣的立場不但說明了科學實存論的「實在論」立場，也揭示其「有限度的自然主義」主張。關於 Bhaskar 對於其「有限度的自然主義」和「結構—行動者問題」的進一步闡明，參閱 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2nd ed. (Harvester Wheatsheaf: London).

<sup>註⑥</sup> 關於非經驗論，指的不是「反經驗論」，而是強調除了經驗層次上的認識能力外，並不能排除非經驗層次(如實存或實現層次)的存在。這所隱含的是，「認識論」上不應該以「經驗主義」為唯一的依歸。William Outhwaite,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Realism,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9), ch. 2.

<sup>註⑦</sup> 黃受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 313~333。

衷和妥協的色彩。因為就「客觀－涉入」的「理論－實踐」問題來說，雖然「結構－行動者」關係所體現的是「社會轉化」(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可能性，但這並非全然建立在行動者間的「意念結構」(ideational structure)或現實的「物質結構」(material structure)上；因此在肯定社會科學研究必然是具有「涉入」的「主觀性」和「目的性」同時，也強調「實踐」必然具有相對的「客觀性」，就是不能脫離現實的可行性基礎上。<sup>⑧</sup>這樣的觀點不僅與馬克思傳統有相當的共通性，事實上更接近於哲學上的「批判理論」思潮，也是許多學者認為「科學實存論」具有「批判理論」特質的原因。因此，就「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的論爭而言，「科學實存論」與「批判理論」同樣主張「最小著落主義」(minimal foundationalism)的立場，<sup>⑨</sup>因為這不僅是來自於其「理論與實踐」上的折衷觀點，更是來自其傾向重建「啟蒙計畫」(Enlightenment Project)以及「科學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的哲學立場。<sup>⑩</sup>換句話說，儘管科學實存論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主張使其能夠在「哲學上」解決所謂「第三次大辯論」的這些核心論爭，其必然面對的是在方法論上來自「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兩方面的挑戰，因為除非其能證明在方法論上科學實存論的研究如何有別於這兩大陣營，並且展現其經驗研究上與國際關係研究有關的成果，否則其不但被「實證主義」陣營批評不具備任何實證的經驗意涵；同時也被「後實證主義」批評為是等同於「實證主義」陣營的修正立場。對他們而言，科學實存論不但沒有展現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與實證主義妥協的正當性，並且其本體論上與「後實證主義」較為接近的觀點也只是其在「理論與實踐」問題上「有口無實」的矯作表態。<sup>⑪</sup>

至於其他的「建構主義」學者，基本上他們並沒有像Wendt一樣，在社會科學哲學上有那麼強的主張，直到九〇年代中期之前，除了Onuf之外，並沒有對於「建構主義」有清楚的主張，也沒有認知自己為「建構主義學派」的一員。因此實難將他們在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初期發表的文獻視為是在「建構主義巨型理論」同一學術潮流下的系統性建構。甚至可以這麼說，這些學者基本上在「第三次大辯論」的時空脈絡下，其對話的對象是主流理論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學者，而關注的議題是那些被主流學派忽略或者視為不重要的議題，以及那些雖然主流學者重視但在解釋上令人非常不滿意的議題。他們並不重視「哲學」或者那些無關於經驗理論的「後設理論」議題，而是強調許多現實國際政治運作的相關研究，包括國際組織、國際規範、外交政策、國際法及制度層面的研究。他們不滿意主流理論脫離現實的許多既定假設，而從各方面對這些假設加以挑戰，來凸顯主流理論不切實際及過度偏狹的發展。事實上他們的研究比起主流學者來說，不但更具有政策相關的意義，並且也較符合現實的國

註⑧ 黃曼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211～224。

註⑨ Steve Smith, "The Self-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n B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ch. 1.

註⑩ 黃曼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327～339。

註⑪ Doty對於Wendt其新作的走向上，就會提出類似的批評，參閱Roxanne L. Doty, "Desire All the Way 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37～139.

際政治運作。

因此，相對於先前所提「第三次大辯論」的四軸向核心論爭，這裏所指稱的「建構主義」學者並沒有一致，甚至明顯的立場可尋。因為就「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來說，雖然多半的學者採取歷史方法、制度分析、或社會學分析等非數量方法，但其也不排斥採用必要的數量方法，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其實並不存在此軸向的問題，他們基本上仍是屬於實證主義傳統。就「客觀－涉入」的「理論－實踐」問題來說，由於其研究的「政策相關」走向，他們熟知社會科學研究必然會對於現實有所影響；然而他們並不認為哲學層次的「理論－實踐」問題屬於國際關係研究的範疇，因此正如同「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的論爭一樣，這兩軸向議題多半被視為是不相關的。至於「個體主義－整體主義」的論爭，其所強調的是在方法論上在「分析層次」的問題，而非認識論或本體論上的「後設理論」問題；因此他們對於「個體主義」或「整體主義」的主張或挑戰，是基於特定議題分析上的對於現象的解釋是否令人滿意，而非來自哲學上的特定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學者中，Nicholas G. Onuf 可說是真正系統性地對於「建構主義」有所主張的學者。然而這裏必須強調，儘管在對於「建構主義」內涵上，如對於「無政府狀態」預設的挑戰，強調「規範」、「認知」、「文化」以及「社會互動」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性，Onuf 並不同意 Wendt 以及 Giddens 在「結構－行動者」問題上的主張，也不認為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為哲學基礎的「建構主義」能夠解決「第三次大辯論」中「後實證主義」對於「實證主義」在國際關係研究，乃至社會科學研究上抱持「自然主義」信仰的強烈反對，<sup>②</sup>因此沒有理由將 Onuf 的「建構主義」視同與 Wendt 是發源自相同的理論根源和哲學觀點。<sup>③</sup>

至於莫文所指稱為「建構主義」的「後實證主義」學者，事實上各學派，甚至是同一學派的不同學者間，對於「第三次大辯論」的立場都差異甚大。這個現象在女性主義學派中最為明顯，原因是女性主義所最關切的「性別」(gender)議題，並沒有被涵蓋在先前所提的四核心論爭中，因此對於「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個體主義－整體主義」這兩個關於科學哲學上的重要爭論，其實並不相關。<sup>④</sup>然而就「客觀－涉入」的理論與實踐議題，以及「著落主義－非著落主義」的論爭，雖然多數女性主義者都傾向將自己定位在後實證主義陣營，但由於女性主義的流派衆多且立場不盡相同，實難從這兩軸向清楚的定位其在「第三次大辯論」的立場，<sup>⑤</sup>不過基本上，她

註② Nicholas G.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2~65, 223;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álková,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p. 58~78.

註③ 基本上 Onuf 和 Kratochwil 在「科學－詮釋學」論爭的立場是傾向「詮釋學派」的，與 Wendt 所主張的「有限度之自然主義」立場是不同的。參閱 Steve Smith, "Wendt'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59~160.

註④ 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 7。

註⑤ 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頁 231~233。

們共同挑戰的是實證主義科學觀的「著落主義」立場，及其以「科學中立性」的「理論與實踐」主張來刻意忽略或是漠視「性別」議題。

至於「批判理論」主要強調的是「理論－實踐」上對於重建「啓蒙計畫」的使命，以及如何避免在落入「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的認識論極端立場。因此如何在認識論上建立「最小著落主義」，同時不重蹈「實證主義」窠臼即成為批判理論學者的主要議題。在這點上，批判理論與科學實存論所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然而批判理論如同其他的「後實證主義」一樣，並沒有對於科學哲學部分的論爭有所主張。<sup>⑯</sup>

就「後現代主義」學者而言，儘管有些學者對於自己被歸類於此並不以為然，基本上他們是反對「啓蒙的計畫」，並且主張「反著落主義」的立場。<sup>⑰</sup>他們對於實證主義的批判正如批判理論學者和多數女性主義學者一樣，反對「知識的中立性」主張，和「實證主義的理性觀」所帶來「現代性」(modernity)的問題。然而他們並不認為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找到「批判理論」所期待的「阿基米得支點」(Archimedean point)，<sup>⑱</sup>如此做只會再一次落入「實證主義」的窠臼中，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科學實存論或批判理論所試圖追求的折衷立場無異是徒勞的。

本節已將莫文中所泛稱的「建構主義」學者在四個重要的「第三次大辯論」論爭中的立場作了大致的分析；然而可以發現，對於不同學派來說，第三次大辯論所代表的意義並不相同，這裏將用下面四點來作一小結：

一、對於科學實存論學者而言，實證主義錯誤的科學觀不但創造「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和「個體主義－整體主義」這兩個根本不應對立的辯論；也因此實證主義在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上刻意將「人與知識」的社會關係忽略，但卻企圖維持特定的既存結構關係。換句話說，源自於認識論上的「經驗主義」和「邏輯主義」使得實證主義者堅持認識論上的「理性主義」是追求「真理」的唯一之道，<sup>⑲</sup>這所衍生出的是堅持「科學中立性」的立場以及反對「客觀知識」的「主觀化」和「政治化」。上述這些問題，正是科學實存論認為應該打破，並且是「第三次大辯論」最主要的核心所在。

二、對於多數的「建構主義」學者來說，他們並不認為科學哲學上的問題應該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焦點，而「第三次大辯論」對於他們而言，主要的意義在於美國學派的主流理論在經過「冷戰」瓦解後的世界巨變，已經面臨徹底的崩解。而儘管「建構主義」在九〇年代中期之前並非指涉一個有系統的一致性學派，但隨著對於主

註⑯ 基本上從 Habermas 對於人類知識的三分類來看，批判理論並不否認「經驗－分析科學」(empirical-analytical science)的價值，但是就理論與實踐的觀點來看，國關研究顯然是屬於「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因此批判理論學者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另外一套科學哲學觀點，而是強調在「理論－實踐」上實證主義的謬誤。關於 Habermas 的分類，參閱 Ju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J. Shapiro trans. (Oxford: Polity Press, 1987), pp. 301~317.

註⑰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Norma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 8.

註⑱ Richard J.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Oxford: Basic Blackwell, 1983), p. 16.

註⑲ William Outhwaite,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ch. 2.

流學派理論的不滿及挑戰日益增強，以及世界局勢變遷所帶來理論建構上的衝擊，都使得「建構主義」在九〇年代中期後的匯流已超越了在「第三次大辯論」時期的各自學者的理論立場分野。也就是說，這些學者之所以整合在「建構主義」研究綱領之下，不是因為其對於「第三次大辯論」所著重的「後設理論」層次論爭有深切的共識，<sup>⑩</sup>而是因為對主流理論共同感到不滿。這樣的整合與匯流，事實上與「第三次大辯論」所關切的核心議題關係並不直接，也不明顯。

三、對於那些「後實證主義」者來說，「第三次大辯論」主要是「理論－實踐」的問題，而「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正是此議題中的核心焦點。因此對於「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和「個體主義－整體主義」這兩個屬於科學哲學的論爭，他們對於問題本身並沒有太多意見，而是反對實證主義將國際關係研究塑造成一種客觀中立的知識，企圖用科學的面貌來合理化他們意圖在實踐上所造成的影響，來維護既存之人為和武斷的結構。由此看來，在「解構」的層面，「後實證主義」有一致的共識，即反對實證主義「科學觀」所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問題；然而在「建構」的層面，「後現代主義」否定「建構」的態度卻與「批判理論」主張謹慎「建構」的態度產生強烈的衝突。而對「女性主義」者來說，由於其學派內部對於「建構」態度的過於分歧，因此整個學派對此並沒有一致的觀點。

四、歸結莫文所指涉的「建構主義」學者，其實對於「第三次大辯論」並沒相同的立場和觀點；事實上即便「建構主義」在九〇年代中期之後，於美國學界所匯流而成的一股學術風潮，也實難真正跟那些在英國學派中所強調「理論－實踐」或者是「後設理論」的「第三次大辯論」議題有太多交集。因為「匯流」之後的建構主義走向，除了Wendt之外，多半是朝向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方向發展，而逐漸失去了（或者原本就不存在）對於「第三次大辯論」中「理論－實踐」議題的關注。這個結論十分重要，因為下面對於Wendt在「建構主義」理論上與其他學者不同的討論，必須建立在這樣的認知上才能理解，這一點正是莫文在介紹「建構主義」理論中發生誤解的地方。

## 肆、Wendt 的「社會建構論」

由上面的討論可知，Wendt 在「第三次大辯論」主要面臨的挑戰有三：一、他如何向「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證明其「科學實存論」不但可以解決實證主義所關切的「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和「個體主義－整體主義」論爭；同時又能解決「後實證主義」所關切的「理論與實踐」和「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論爭。二、這項工作關乎 Wendt 如何從「哲學上」（包括科學哲學及社會哲學）、「方法論上」到「理論建構」和「經驗檢證」層次建立一個「巨型理論」，來真正說服「實證主義者」和「後實證主義者」在他們所各自關切的層面上接受「科學實存論」所建構的「巨型理論」。三、上述的目的要能達成，絕非單靠 Wendt 一人之力，因此他如何能夠引起歐

---

<sup>註⑩</sup> 同註⑤，p. 3.

美學界對其「研究綱領」的重視，以及如何引導目前「分裂」且有些「偏狹」的國際關係理論學界（在「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陣營都是如此）重起共識和對話，則是他關注的當務之急。限於篇幅，這裏無法詳細討論所有相關的議題；而下面對於Wendt的「社會建構論」討論，將把焦點放在回答三個問題上：一、為什麼區分Wendt和其他「建構主義」者在了解「第三次大辯論」上有筆者所宣稱的重要性？二、「科學實存論」的主張如何，以及何種程度上使得Wendt必須與其他「建構主義」學者有所區分？三、如何從Wendt將「科學實存論」用在建立其「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的哲學基礎，來理解「第三次大辯論」所帶給國際關係學界的重要啓示？

本文再三強調，理解「建構主義」的關鍵在於對「結構－行動者」問題<sup>①</sup>的掌握，因為整個Wendt的「社會建構論」<sup>②</sup>以及其他「建構主義者」之所以亦被視為與Wendt屬於同一「研究綱領」的原因正在於此。然而雖然Wendt與這些學者在「結構－行動者」問題上有相同的主張，並且也成為學者歸類「建構主義學派」時的主要依據；但是「科學實存論」的哲學基礎使得我們必須特別將Wendt與其他學者分開，否則是不可能去理解為什麼「科學實存論」與國際關係理論相關、為什麼Wendt在其新書中用了如此多的篇幅來討論「科學實存論」、為什麼「建構主義」在九〇年代中期之前沒有在國際學界形成一股重要的學術潮流，以及為什麼那些原先沒有自我認知（self-identify）或被他人稱為「建構主義者」的學者在近年來如此快速聚合而形成現在一般

註① 關於「結構－行動者」的辯論，請參考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5~370;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1989), pp. 441~473;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Alexander Wendt, "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83~392;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Beware of Gurus: Structure and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93~410; Alexander Wendt, "Level of Analysis vs. Agents and Structures: Part III," *Review of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p. 181~185;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Structure and Action: Further Com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 (1992), pp. 187~188;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Two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Review of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0, No. 3 (1994), pp. 241~251; Vivienne Jabri and Stephen Chan, "The Ontologist Always Rings Twince: Two More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Reply to Hollis and Smit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6), pp. 107~110;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A Response: Why Epistemology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6), pp. 111~116. 此外近來亦有許多專書和期刊論文對此都有討論，有興趣者可以從RIS, EJIR, ISQ等期刊或(Kubálková, Onuf and Kowert, 1998), (Friedman and Starr, 1997)找到相關文獻。參閱，Vendulka Kubálková,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Gil Friedman and Harvey Starr,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Ontology to Empiric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註② 關於Wendt的「社會建構論」，以他在1999年的新書為集大成之作。參閱，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所稱的「建構主義學派」？

Wendt 在「結構－行動者」問題上的核心主張是：「結構」和「行動者」在本體論上是相互「構成」、「再生」和「轉化」的，而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由於研究對象是所謂的「社會客體」，其在本質上是有別於「自然客體」而屬於「相對恆常之科學標的」，因此「結構」和「行動者」在本體論上都不具有「獨立」的「本原地位」；而他們的本體論地位，唯有在「共存」且「相互構成」的情況下才有意義，並且其「相對恆常」的本體特質，也唯有透過「再生」和「轉化」的「構成關係」，才能持續的展現和成立。<sup>⑩</sup>

這樣的主張，如同先前所提的，基本上在哲學層次克服了「第三次大辯論」在「科學哲學」上「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和「個體主義－整體主義」的兩軸向論爭。因為從這樣的「結構－行動者」關係主張上，「科學實存論」展現了其在「本體論」上對於社會科學的「有限度自然主義」( limited naturalism) 和「結構－行動者的共決 (co-determined) 、再生和轉化」的主張，因此國際關係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門，其研究不應該存在「科學－詮釋學」與「個體主義－整體主義」的二分對立，而是統一在「科學實存論」對於在科學哲學層次上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一貫主張。這樣的意圖和嘗試不管對於「實證主義者」、「後實證主義者」乃至於「科學哲學家」都是十分「大膽」、「冒險」、「難以置信」，甚至是「註定失敗」的。因為倘若這樣的企圖能夠成立，那不單是在國際關係理論上解決了「第三次大辯論」，其對於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於哲學上千古存在的「主觀主義－客觀主義」或「身心二元辯論」( mind vs. body )，都具有劃時代的決定性貢獻。不過也正因如此，其隱含的是「科學實存論」在研究範疇中所涉及問題之廣度和深度，以及被各種不同觀點、學派和學門領域學者所評價標準的嚴苛，都令這樣的企圖難以被認真對待，更遑論開始真正進行有系統的嘗試。

然而在國關理論學界中，由於科學實存論的主張（主要是「結構－行動者」關係）透過 Wendt 有系統的引介，以及冷戰結束等世界的巨變，使得其對於國關理論在「國家系統」層次上，對於那些原本就不滿意主流「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辯論的學者們，產生了極具吸引力的「隱喻」( metaphor )。更由於這些學者原先對於「新－新」研究綱領的極端「個體主義」假設的不滿，以及許多社會學理論對於「制度」、「規範」、「利益形成」、「認同」和「社會互動」的主張上，在國關理論的場域上所可能展現的強烈經驗事證，都讓這些學者意識到以「結構－行動者的共決、再生和轉化關係」作為「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上的核心假設，不但能夠將其過去的研究統整在這樣的研究綱領下，同時不管在方法論上、理論上和經驗證據上對於主流學派產生強而有力的挑戰；因此即產生了九〇年代中期之後，產生了老、中、青不同世代學者的匯流，於是乎「建構主義」在十分短暫的時間內形成美國學界一股重要的學術潮流，並佔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sup>⑩</sup>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然而，這並不是說「科學實存論」所有的「科學哲學」主張都被這些「建構主義者」熟知、理解、信服、產生認同而用在國際理論的研究上；相反地，由於「科學實存論」的艱澀難懂，以及其多半學術論著充滿了十分難以親近的哲學術語（Bhaskar在八六年之後的作品最為典型），<sup>④</sup>因此極少有國際關係學者真正了解「科學實存論」的哲學論述，<sup>⑤</sup>所以實際的現象是：這些學者基本上不贊同（不管是了解但不同意、不了解、還是根本不認為有必要去了解）Wendt將「科學實存論」大量引入國際的論述中，主張僅擷取其「行動—結構者」關係，以及其他在此問題上相似的社會學理論，如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Bourdieu和Lader的社會學理論，來作為其「建構主義」在方法論上的依據，<sup>⑥</sup>而不將「科學實存論」整個哲學體系視為其理論根據的來源。在這點上，Wendt與這些「建構主義者」產生了根本的歧異，因為即使「行動—結構者」關係在「科學實存論」中是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可是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其在當代科學哲學中的角色和地位，而斷章取義的將「行動—結構者」關係大量運用在國際關係的分析上，不但無法體現「行動—結構者」關係在「第三次大辯論」上的重要性，更嚴重的是會產生方法論上的誤解和濫用。

這個的論點十分重要，因為它回答了本節關切的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區分Wendt和其他「建構主義」者在了解『第三次大辯論』上有筆者所宣稱的重要性？」。舉例來說，許多「建構主義」學者將「結構」與「行動者」不加解釋的預設成為「國際社會」和「國家行動者」，並強調「意念結構」對於「物質結構」在形成國際制度、規範，以及國家行為上的驅動力量，來挑戰「理性主義」從「個體理性」角度出發對於許多國家行為明顯不符合「效用極大化」的異例，並宣稱「建構主義」比「理性主義」更能適切的解釋現實的國際關係。但在缺乏對於「科學實存論」整體哲學體系的認知

註④ Bhaskar在86年之後，除了89的作品是收錄他過去所發表的散篇文章外，比較容易閱讀外，其91、93、94年之作都十分的艱澀。參閱，Roy Bhaskar,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1986); Roy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1989); Roy Bhaskar, *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Roy Bhaskar,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Verso, 1993); Roy Bhaskar, *Plato Etc.: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and Their Resolution* (London: Verso, 1994)

註⑤ 儘管如此，個人強烈建議有心研究「建構主義」的學者都應該儘量能多了解科學實存論，基本上目前已有一些二手詮釋的文獻出版，這些文獻會使讀者較容易進入「科學實存論」的哲學體系中。參閱William Outhwaite,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Jeffrey C. Isaac, "After Empiricism: The Realist Alternative" in Terence Ball, ed., *Idioms of Inquiry: Critique and Renewal in Political Science* (Albany: SUNY, 1987), ch. 8; Andrew Sayer,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Peter Manicas, "A Realist Social Science," in idem.,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ch.13; Andrew Collier,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ocialist Thought*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89); Andrew Collier, *Critical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1994)

註⑥ 對於在「結構—行動者」問題上觀點與「科學實存論」或「結構化理論」相近的其他理論介紹。參閱，N. J. Thrif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Society and Space*, Vol. 1, No.1 (1983), pp. 23~57.

下，這樣的觀點不但不成熟，甚至沒有比「理性主義」的解釋更能增加我們對於現象的了解。問題出在：「國際社會」與「國家行動者」並非「給定」（exogenous）的既存實體，因此其本體的存在是奠基於先前兩者的「再生」和「轉化」關係，如果沒有在相當程度體現「結構與行動者」在分析時點上明確地是處於「再生」還是「轉化」的關係，則無法將「結構因素」和「行動者因素」的「構成關係」和「因果關係」清楚的闡明，<sup>⑦</sup>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國際規範」有時可以形成，有時不能；又為什麼有時會被遵守，有時卻不被遵守。又如倘若沒有對「行動者」（國家）的「利益形成」（interest formation）有清楚的解釋，或者沒有考慮在「次國家系統」（sub-state system）層次（國內政治結構與各種可能的政治行動者所形成另一行動與結構者關係）的相對穩定性，實難讓人不懷疑「建構主義」在此亦產生自己所極力批判的「將行動者（國家）化約成完全被動地由結構（國際規範）來決定其行為的結構主義謬誤」（fallacy of reification），並且也與自身在「結構—行動者」關係上的主張發生矛盾。<sup>⑧</sup>然而，這裏所提到的問題僅是一小部分而已，在許多對於「建構主義」學者的批評上，我們都可以看到許多如此「犀利」且令這些學者無法單從「結構—行動者」關係作為一方法論上的「研究方法」來加以辯護的批評。事實上這些對於「建構主義」的批判，從「科學實存論」的觀點來看，某些是「建構主義」學者對於「結構與行動者」關係的誤用和濫用，某些是批評者對於「科學實存論」的誤解或不了解所致；但更多的是「科學實存論」本身在應用於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上尚未突破的限制。在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於二〇〇〇年專門對於 Wendt 新書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所開闢的「論壇」（Forum）上，Wendt 與不同理論學派學者的精彩交鋒，正體現了許多 Wendt 對於將其「科學實存論」運用在國際關係理論上的反

註⑦ 有些人誤解「科學實存論」所主張的「建構性理論」和「因果性理論」是互斥的（莫文在此點上有嚴重誤解）。事實上從 Smith (1995), Wendt (1998), Wendt (200), 黃曼華（民國八十七），以及科學實存論的一貫哲學體系來說，「建構性理論」和「解釋性理論」在社會科學中絕對是互補，而非互斥的。這點可從其「有限度自然主義」以及「理論與實踐」主張上的批判特質，都可以清楚的理解。參閱 Steve Smith, "The Self-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7; Alexander Wendt,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Special Issue (Dec. 1998), pp. 101~117.

註⑧ Checkel 在評論 Finnemore, Katenstein 和 Klotz 的「建構主義」曾對於上述的方法論問題提出類似的批評。雖然其批評或許帶有誤解這些建構主義者的可能，然而從「科學實存論」的觀點出發，其批評的確是對於如果僅將「結構—行動者」關係當作一種研究方法，而未對於科學實存論哲學體系有深入理解的「建構主義者」的嚴重挑戰。參閱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Audie Klotz,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省和思考；<sup>④</sup>這包括了對於其運用在國際關係分析上的限制、學者可能對於「建構主義」的誤用、批判者如何因為不了解「科學實存論」在「第三次大辯論」的角色和地位所作出的誤解，以及「科學實存論」本身在哲學上所遇到的問題。這些討論，不但有助於思考未來「科學實存論」在「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有所貢獻，同時也清楚地提醒許多「建構主義者」在使用「結構－行動者」關係作為其「建構主義」的核心假設同時，必須更為謹慎來思考其可能發生的問題及運用的極限。他們或許不必要是「科學實存論」的擁護者，但缺乏這些思考將使這樣的「建構主義」研究失去其原本應該具有的優勢，並且可能在解釋國際政治的價值上，遠不及於其所批判的「理性主義」或「後實證主義」學派。

然而，究竟 Wendt 如何主張「科學實存論」可以運用在國際關係的分析上？關於這點，下面的認知有助於我們勾畫其藍圖：

一、「結構－行動者」關係對於「科學實存論」來說是「本體論」的主張，而非「方法論」上的主張。也就是說，當我們對於國際現象進行分析時，「結構－行動者」關係有助於在「分析層次」問題上讓研究者從「方法論」的角度思考：(一) 如何對於分析單元進行切割？(二) 那一個層次的「因果關係」或「構成關係」以及「意念結構」或「物質結構」對於整體現象的作用較為顯著？然而其卻不能決定我們應該使用何種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因為「科學實存論」在「方法論」上並沒有對任何的特定研究方法有強烈的主張。科學實存論不排除數量方法、統計分析、歷史研究、社會學、人類學甚至是整合自然與社會科學的「複雜理論」(complex theory)來進行研究，<sup>⑤</sup>而這種在方法論上的「實用主義」傾向，不但反應了其「認識論」上的「多元主義」；也體現了其主張「本體論」大膽建構、「認識論」多元開放以及「方法論」謹慎思考的一貫性哲學立場。這其實正是對於「第三次大辯論」中「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不管在「科學－詮釋學」研究的爭論，還是認識論「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的爭論，抑或其所產生「將本體論化約成認識論」的問題，試圖從哲學基礎上來解決這些根本問題，並且將「科學活動」與「理論與實踐」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變成是兼容並蓄，而非互斥對立的觀點。

二、「科學實存論」在「本體論」上所主張「真實的分層化」以及「形構特質」<sup>⑥</sup>(emergent property)對於「社會科學研究」來說，正是強調「學術分工」的必要及重要性。比如說：投票行為必須是在對於特定社會情境的了解下才能理解其社會意義，

<sup>註④</sup> Robert O. Keohane, "Idea Part-Way 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25~130; Stephen D. Krasner, "Wars, Hotel Fires, and Plane Crash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31~136; Roxanne Lynn Doty, "Desire All the Way Down"; Hayward R. Alker, "On Learning from Wend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41~150. Steve Smith, "Wendt's World";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65~180.

<sup>註⑤</sup> Hayward R. Alker, "On Learning from Wendt."

<sup>註⑥</sup> 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pp. 97~98; Andrew Collier,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ocialist Thought*, pp. 48~51.

然而對於其如何使用公車到達投票所，何種物理和化學作用使得公車能夠達成其通勤的目的，何種生理機制使其能夠完成投票行爲等，則必須深入「政治學」——解釋選舉在政治社群中的意義，「經濟學」——他為何選擇公車、如何知道使用貨幣來交換服務（通勤），「物理學」——為什麼公車會行進，「化學」——汽油是如何提供公車行進的動力，「生理學」——他的視覺和聽覺等各部神經、大腦的訊息傳遞以及身體各部分的肌肉是如何使其能夠完成投票的動作，這些都顯示了學門區分的必要性。這種「形構特質」所隱含的，是提供「方法論」上將研究對象進行切割的正當性；也就是說，「科學實存論」主張在基於本體論上對於研究客體之「結構－行動者」關係有適切了解的前提下，將「分析層次」問題進行「方法論」上的考慮是必要的。例如，在國關研究中，如果研究現象在「國內系統」層次呈現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在此條件下「給定」的假設是可接受的），是可以將國家視為「單一的行動者」。因為「國家」既是「國際系統」層次下的「行動者」，同時又是「國內系統」層次下的「結構」；因此如何決定適當的切割或者如何處理兩層次間的交互關係，不但與其本體論的「結構－行動者」關係沒有衝突，而且是必要的。<sup>⑫</sup>

三、「結構－行動者」關係的「相互構成」、「再生」和「轉化」特質，使得「意念的」和「物質的」因素都不能單獨的來對於結構或行動者本身進行解釋。原因在於人類的行爲具有目的性，這樣的目的性有可能是「意念」因素或「物質」因素所驅使，然而缺乏可能的「物質基礎」，「意念」成為「空想」而非行爲，而沒有「意念因素」的作用，行爲本身缺少「社會意義」而非屬於「社會科學研究」的範疇。因此兩者間的交互關係，決定了在其「結構－行動者」關係的主張下，如何對於「社會客體」來進行解釋。雖然 Wendt 在其新書中自我表明是「意念主義者」，然而這樣的立場宣示是刻意的凸顯其「社會建構論」相對於「新現實主義」過度強調「物質結構」、「個體主義」的不同，而非其理論主張上真正的立場表明。<sup>⑬</sup>這樣的寫作策略，儘管成為許多學者批判 Wendt 的「社會建構論」主張來源（批判者並不認為這是寫作策略，而是 Wendt 理論的根本缺陷），Wendt 認為這是他基於當前美國主流學派發展的核心問題來進行挑戰的方式；並且他的目的並非建立一個無懈可擊的國關理論，而是希望能引起大家對這些議題進行深入的思考。<sup>⑭</sup>因此這提醒了閱讀 Wendt 新書的讀者，如果沒有全面理解「第三次大辯論」各軸向的重要議題，同時對於「科學實存論」的哲學體系又沒有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對於當代歐美的國際關係學界脈絡演變的陌生，是非常有可能對於 Wendt 的新書產生極大的誤解。而這也正是本文希望對於莫文所可能造成的誤解進行釐清，希望能對於理解「建構主義」的發展有所幫助。

四、嚴格來說，Wendt 在其新作中的確缺少了在「理論－實踐」和「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議題上的深入討論；這也難怪被「後實證主義者」視為 Wendt 又向「實證主義」陣營立場靠攏的「退步」表現。事實上如果就 Wendt 在書中所極力尋求如何

註<sup>⑫</sup>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pp. 174~175.

註<sup>⑬</sup>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p. 167.

註<sup>⑭</sup>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p. 165.

「科學地」進行「建構主義」研究的目的來看，以及其在 *RIS* 「論壇」中回應後現代主義學者 Doty 的立場來看，的確 Wendt 是讓「後實證主義者」大失所望。<sup>55</sup>因為 Wendt 的基本態度，正如同許多主流學者對於「後實證主義」的態度一樣，就是除非在經驗研究的證據上能夠支持「後實證主義」對於「實證主義」的挑戰，否則沒有理由放棄一個在理論累積和經驗研究上具有相當成果的研究綱領，而來接受一個相對上在這些層面都顯得較不成熟的研究綱領。這似乎代表 Wendt 仍然接受「實證主義」的那套「科學中立」觀點，並且將其「科學實存論」在「建構主義」上的運用偏斜到強調「科學」研究的「自然主義」立場，而忽略了「理論與實踐」上「科學實存論」所具有強烈的「後實證主義」意涵。然而這樣的觀點究竟是因為 Wendt 切身所處的學術環境，造成他不得不傾向以這樣的方式來尋求與美國主流學派的對話，還是真的他在「理論－實踐」的議題上向「實證立場」退縮？本文主張這正是 Wendt 所面臨的最嚴重挑戰，因為即便他僅是權宜性的尋求與主流學者最大可能的交集和對話，他也必須面臨如何在「理論－實踐」和「最小著落主義」立場上克服「科學實存論」所產生的內在衝突。這樣的問題不僅是哲學上的如何自圓其說，更是在實踐上如何落實其承諾的問題。對此問題，Wendt 似乎傾向現階段「後實證主義」陣營必須對於其「實踐性」的問題加以檢討，因為對於「建構」的不足、甚至是否定的態度都使得「後實證主義」缺乏正當性基礎來進一步替代「主流理論」，正如同「意念」的作用必須奠基于適當的「物質基礎」上。顯然的，「後實證主義」目前並不具備這樣的基礎。

從上述四點對於 Wendt 在「社會建構論」上的基本認知，本文強烈主張由於 Wendt 所具有的「科學實存論」哲學根源，使得在討論近年歐美學界「建構主義」所引發的學術風潮時，必定要將 Wendt 與其他「非科學實存論」根源的學者有所區分。而這也回答了先前本節所提的第二個問題：「『科學實存論』的主張如何，以及何種程度上使得 Wendt 必須與其他『建構主義』學者有所區分？」因為如果不加以區分，不但無法理解 Wendt 在「社會科學哲學上」的論述是如何地與「第三次大辯論」和「國際關係研究」有所關連，同時也無法深入許多 Wendt 在「建構主義」上的細緻論述。事實上，這樣的現象反映在許多國關學者其實看不太懂 Wendt 的學術論著之情況，縱然勉強對其進行了解，也往往是從其所舉的事例中，或者是他先前較為傾向個案研究的文獻，<sup>56</sup>抑或對於批判他的學者之回應來理解 Wendt 的「社會建構論」。然而如同本節先前所討論的，這樣的了解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也無法真正了解整個國關學界近二十年來的發展。

最後，儘管上面已經詳細的進行討論，這裏還是要回答先前本節所提的第三個問題：「如何從 Wendt 將『科學實存論』用在建立其『社會建構論』的哲學基礎，來理解『第三次大辯論』所帶給國關學界的重要啟示？」基本上對於 Wendt 來說，其以

<sup>55</sup>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pp. 179~180.

<sup>56</sup>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4 (1995), pp. 689~721.

「科學實存論」為根基的「社會建構論」面對三個主要的戰場：首先，他必須能夠向美國主流的學派證明「科學實存論」不但與國際關係是相關的，同時也必須展現其對於國關研究的經驗成果和理論累積，而這主要的工作便在於體現「科學實存論」如何的可以將其「社會建構論」進行科學性研究，這是他面臨「實證主義」所必須打的一場硬戰，也是他目前所專注的。其次，他必須向「第三次大辯論」中的「後實證主義」者展現他的「科學實存論」主張，是如何地可以在進行國際關係的「科學性研究」的情形下，同時又能不重蹈「實證主義」者在「理論－實踐」和「著落主義－反著落主義」議題上的嚴重錯誤；這也就是說，他必須證明其「社會建構論」如何是「科學的」，並且更是「批判的」。第三、他必須面臨跨學科，尤其是「科學哲學」界對於他在「科學實存論」上所企圖解決因「第三次大辯論」所引申的更高層次之哲學問題。事實上，Steve Smith 在與 Wendt 近十年來一連串的辯論中，所強烈質疑的就是他將「科學實存論」進行過度的宣稱，而這樣的質疑所針對的，就是 Wendt 到底在「哲學層次」上的主張夠不夠深入，有沒有產生誤解的懷疑。<sup>⑦</sup>事實上這樣的懷疑不僅是在「哲學上」，Hayward R. Alker 在 RIS 的「論壇」中就曾提醒 Wendt 以及有意追隨他從事「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研究後進，必須注意在「語言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演繹生化學」（evolutionary biochemistry）、「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計算機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和「複雜理論」等科際整合的發展，<sup>⑧</sup>而這正是 Wendt 未來所面臨的更大挑戰，不過同時也是突破瓶頸的新契機。

總之，Wendt 的「建構主義」世界對於一般國關學者是過於的玄虛，他們無法了解多數 Wendt 的論述與現實國際關係有什麼關連，然而 Wendt 在近來的學術發展的傾向所急欲克服的正在於此。不過由於他的理論體系所牽涉的範疇實在過於廣泛，而且所關注之議題往往都是該領域最困難或者尚未發展成熟的部分，導致他無法面面俱到，事實上這原本就是不可能任務。但是可以預期的，以 Wendt 所處的美國學界目前仍以「實證主義」當道的情況下，「後實證主義者」認為其向「實證主義」靠攏的不滿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源自於科學實存論中「有限的自然主義」主張，最終仍將掉入「實證主義」的窠臼，是行不通的。

## 伍、對於「社會建構論」的釐清

簡而言之，由於莫文在介紹「建構主義」時，並未詳究「第三次大辯論」的核心議題，也未對「科學實存論和近二十年來國關學界理論演變提供基本介紹；因此不但在「建構主義」學者的分類上造成模糊現象，同時未區分 Wendt 和其他「建構主義」學者的差異。在前面幾節的討論中，本文已經對於這些誤解做了說明，下文將進一步

<sup>註⑦</sup> Steve Smith, "Wendt's World."

<sup>註⑧</sup> Hayward R. Alker, "On Learning from Wendt." p. 143.

針對莫文在「建構主義」上的不足，提出釐清與補充討論，盼有助於對於「社會建構論」的理解：

為便於理解起見，特列下表作為說明：

項次	問題	出處	釐清之處	說明
一	「建構主義」也稱……「反思主義」	94頁第12行	「反思主義」和「建構主義」是不同的概念。	Keohane (1988) 所提出的「反思主義」是統稱 Wight 所提三大範疇中之「激進主義」的進一步理論發展，大致上是包括了八〇年代的「後實證國際關係理論」，而非單指「建構主義」。⑩
二	對於「建構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根源介紹	94頁第22行至95頁第9行	「建構主義」不能加以區分其不同學者的主張而直接上綱至「社會科學哲學」層次。	除非指稱的是以 Wendt 為主，在哲學上主張「科學實存論」為基礎的「建構主義」學者，否則如此將「建構主義」統稱為一巨型理論，並且從國關延伸到社會科學哲學領域上的學者仍屬極少數。
三	它（指建構主義）是種不同的聲音……特別是在方法論、本體論與認識論上	95頁第13行	「建構主義」並不具有一致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主張。	除了 Wendt 所根源的「科學實存論」外，到目前為止，「建構主義」並沒有提出一個大多數學者都同意，並且認同為其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共同主張。這裏莫文的用法，所指涉的「建構主義」是一個從哲學開始，貫穿方法論一直到理論層次，特別是國關理論的一致性社會科學巨型理論。但問題這樣的「建構主義」並不存在。
四	建構主義的來源的引註(Neufeld, 1993) ⑪	97頁註⑫	所引註是來自 Neufeld 這位年輕的英國學派學者，其一般為學者歸類於「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之列，雖然他的著作都在反省國際理論的「後設層次」問題，但其文獻並無強烈要建構所謂「建構主義」的意圖，而是在為「後實證國際關係理論」對主流理論作出更強的挑戰。	「建構主義」和「國際關係理論」的合流是在八〇年代末期開始的，然而這樣的合流是包含有許多不同各自的支流，而在其共同挑戰主流理論下，使人感到其主張的相似性。因此，我認為不應濫用「建構主義」一詞，起碼「國際關係批判理論」與「建構主義」之間是兩個有關聯、但絕對是分開的發展脈絡。

項次	問題	出處	釐清之處	說明
五	「建構主義」定義的註釋	96 頁註⑩、註⑪	Onuf 所具有的「傳統建構主義」立場基本上反對 Wendt 將「科學實存論」作為「建構主義」哲學基礎的觀點，這從其八〇年代末期至今始終如一，沒有理由將 Onuf 和 Wendt 視為同源的「建構主義」學者。	很清楚的，在說明「建構主義」的定義上，莫文引註了 Ruggie, (1998)。@然而 Ruggie 認為 Wendt 和 Onuf 是不同流派的建構主義者，前者是「自然主義建構學派」；後者則是「新古典建構主義學派」。事實上從 Ruggie 的行文中，儘管他提及了兩派在理論上的共通性，但他們絕對不是同源的。雖然 Ruggie 在此的歸類與莫文較相近，但問題是 Ruggie 對於不同之處有作解釋，而莫文卻沒有任何說明，容易引起誤解。
六	引用 Mearsheimer (1994/1995)@的觀點來不加區分「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	97 頁註⑫	誤解「廣義批判理論」和「狹義批判理論」在國際關係後實證主義理論上的指稱，並且這裏 Mearsheimer 絶非指稱「建構主義」。	事實上 Mearsheimer 在此是泛指廣義的批判理論用法（在國關理論中指的就是後實證理論），此用法在 90 年代以前常被使用，近來已經較少學者使用。
七	「批判理論」…產生「後現代論」或「後結構論」	97 頁註⑬	在此所指的國際關係「批判理論」不具有產生「後現代論」或「後結構論」的關係。	這句話引自 Devetak (1996) 的第一至第五行，然而這是一個誤解。@ Devetak 所表達的是：「自 1980 年中期以來，國際關係學門已分別遭受許多不同的批判理論（廣義用法）的嚴重挑戰。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接著後現代主義者都給了這個長久以來有幾分成功似地試圖去遮掩其嚴格界限的學門重重的一擊」。至於「批判理論」，絕不是「產生」「後現代論」或「後結構論」（參閱 George 與 Campbell 在 ISQ 90 年之作，莫文亦有引註），@因為 80 年代所出現的後實證主義，其社會哲學層次上的「批判理論」和「後現代」本身是不同的根源，甚至是相當激烈的辯論。@

## 陸、結論

儘管本文對於莫文提出若干評論，但是毫無疑問的，莫文存在許多優點，當應給予肯定。第一、莫文雖然在文獻上有所疏失，但起碼已將大多數入門的文獻有系統的進行整理，這是貢獻之一。第二、莫文在闡述近年匯流後的「建構主義」文獻中，不但相當程度能夠掌握近來研究的發展方向，還能提出「建構主義」所產生的缺點並反省，這是貢獻之二。第三、儘管在概述國際關係理論演變上存有疏誤，但相當程度莫文也給了讀者一個大致的全貌，而提供後進者進入此領域的方向，這是貢獻之三。第四、莫文所涉及的領域甚廣且艱澀，縱然有不盡理想之處，也不失為近年國內介紹「建構主義」的先驅論作。

至於本文的評論和建議，主要是希望能引導未來此領域的發表文獻，能夠儘量的細膩和完整，尤其是對於中英文獻的引用及理解上，能更深入的進行全面性和精巧的分析，畢竟許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果更能仔細發覺和注意的話，對於學術發展的累積將會更有幫助。

最後，雖然本文強調「分類」對於理解上的必要性，然而正如同 Onuf 其在「邁阿密國際關係團體」(Miam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roup) 同僚們在一九九八年所出版的「建構主義」著作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所提的，國關學者和研究生不應該再將時間花在沒有意義的分類工作上，但同時也強調「建構主義」一詞自從 Onuf 在八九年之作提出後，就被許多學者濫用，而不加深思的去定義。<sup>⑨</sup> 雖然去爭論誰是「建構主義」首創者，或誰才應該被稱為「建構主義」並沒有任何意義，

註⑨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pp. 379~396.

註⑩ Mark Neufel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1 (1993), pp. 39~61.

註⑪ John G.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81~882.

註⑫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1995), p. 37.

註⑬ Richard Devetak, "Postmodern"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t al.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6), p. 197.

註⑭ Jim George and David Campbell, "Pattern of Dissent and the Celebration of Differenc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3 (1990), pp. 269~293.

註⑮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Normative Approaches*, ch. 8.

註⑯ 「邁阿密國際關係團體」是 Onuf 在 94 年到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執教後與邁阿密大學教授 Vendulka Kubálková，集合一群對「建構主義」有興趣的學者和研究生所形的學術團體，專門對於「建構主義」來進行研究。其具體成果，就是於 98 年所出版的「建構主義」專著。參閱 Vendulka Kubálková,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p. 4 and p. 193.

但如果過度的濫用，不但只是徒增一個新潮的「學術時尚」，並且也無法對「建構主義」研究作出貢獻，相信這絕不是大多數真正有志於「建構主義」的學者所樂見。因此，未來「建構主義」在國內學界的要能夠真正有所成就，起點正是對於許多深層問題的細緻了解，而本文所論及的「分類」問題，僅是最基本的入門工作而已。

\* \* \*

(收件：89年12月14日，修正：90年2月5日，接受：89年2月8日)

# Review of “On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n-hua Huang*

## Abstract

Dr. Mo's "On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 one of a few recent articles that introduc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ism. However, this article creates much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The main problem lies in its conflation of different variants of Constructivism.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t theoretical origins of Alexander Wendt and other constructivists not only makes the introduction misleading, but also creates ambiguity that confuses readers about what Constructivism i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shortcomings of Dr. Mo's article and proposes some clarifications in order to help encourag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Constructivism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a sophisticated distinction of different variants of Constructivism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o further ou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Keywords:** constructivism; scientific realism;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